

本书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以地域性的文化视角，梳理历史脉络，探索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性精神，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一面镜子。

中国共产党 与广西抗战

——政治交往理性的实践

刘绍卫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与广西抗战

——政治交往理性的实践

刘绍卫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与广西抗战/刘绍卫著.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6.8

ISBN 7-219-05706-7

I. 中... II. 刘... III.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史料—广西 IV. K265.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3358 号

中国共产党与广西抗战

——政治交往理性的实践

刘绍卫 著

责任编辑 廖集玲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 530028 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网址 <http://www.gxpaph.cn>

印刷 南宁市源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印张

字数 241 千字

版次 2006 年 8 月 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219-05706-7/K·1080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探索以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为中心的社会共同体的历史建构

翟鹏玉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及其历史实践，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而国共两党及其他团体、民众共同奏响的广西抗战组曲，无疑在中国抗战史上乃至世界反法西斯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及东南亚战争，是帝国主义扩张在亚洲的反映，是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的结合以及为了攫取世界资源的野心迅速膨胀的必然结果，是新一轮殖民主义的必然逻辑。中华民族的抗战不仅是救亡图存的生死决斗，同时，也激发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如何利用传统资源与帝国主义对抗的激情，寻求中国文化与现代性对激、融合共生的历史使命。针对帝国主义扩张对世界民族体系的打破，刘绍卫以敏锐的历史意识与润色鸿业的文化自觉，着力梳理广西抗战的历史脉络，探究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历史及其政治文化基础，突出中国共产党救亡图存的能动性 with 历史实践理性，进一步探索超越于民族认同形式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机制，关注当时潜藏于世界性的反法西斯运动背后的社会体制革命的历史动态，以及在此动态中反弹出的具有蓬勃生命力的民族国家表述，突出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倡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构建抵御外侮的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中国

共产党如何取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问题，思想敏锐，视野开阔，观点鲜明，分析透彻，有独到的视角和特点，具有较强的逻辑张力，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政治叙事和交往理论开拓地域性抗战研究的力作。

一、视阈的转换——新的历史叙事理论的运用。

过去的党史研究，多侧重于革命意识形态运动的书写，随着对共产党革命历史认识的深入与研究方法论的更新，更具丰富文化内涵的革命史书写，层出不穷。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刘绍卫以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为指导，将中华民族一致对外的民族抗战，放在世界解放中饱含民族性的政治叙事的框架中，以观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广西的历史状况。作者注意发现广西抗战的历史形态、不同时期的任务。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新桂系的民族大义的肯定与激发，并以动态的发展观指出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新桂系集团在“焦土抗战”理论的基础上表现出的抗战思想及其作用：

首先坚持全民族抗战理念（76页）；其次，阐述了发展自己的力量与外援的关系（78页）；再次，坚持抗战，反对投降（78页）。

在民族严重危亡时期，“焦土抗战”口号的提出，体现出坚强的民族精神和气节，对振奋民心、鼓舞士气产生了积极作用（79页）。新桂系的坚持抗战思想与中共的抗战思想都坚持了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念，就有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80页）。

归纳了中共在广西统战工作的历史贡献：

1. 争取、团结桂系抗日，促进国共合作，为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抗日反蒋”转向“逼蒋抗日”提供了重要事实依据，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56页）。

2. 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不仅对蒋介石国民党内外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对西南及其他地方实力派迈向抗日道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59页）。

3. 积聚保护大批抗日文化力量（161页）。

4. 推动了广西全民抗战（165页）。

5. 扩大了革命队伍，保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安全（167页）。

中国共产党以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为号召，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调动了最大的抵御外侮的进步力量，摒弃前嫌，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抵御外侮的民族共同体，在新旧替代中，完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并彰显政治认同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趋同的历史特质，在民族抗战的前提下，将差异融会于一个更大的认同体系之中，以变化的民族观超越旧有的民族国家形态，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表现出极高的政治智慧与组织规则。

刘绍卫进一步总结广西抗战的特点：

一、抗战主体的全民性（13页）；二、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到城乡（17页）；三、抗战形式的多样性（19页）。

最后，揭示出广西抗战在全国的重大作用：

一、广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团结抗战，坚持抗战到底（20页）；二、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光辉旗帜（25页）；三、桂军征战南北，威震敌军，树中国军人的英勇气概（28页）。四、构建了三位一体的战时体系，支援了全国抗战（32页）。

如此，对广西抗战的历史书写，就形成了国、共、日、民等多方力量胶着互动的立体交叉的叙述视角与全方位呈现；既表彰了共

产党的领导地位与作用，又没有忽略国民党及群众在抗战中的作用，表现出历史书写的实录精神。同时，统一战线的形成，标志着革命促生了富含创造精神与社会进化观的民族文化话语系统^①，并且，睿智的共产党人把握历史发展方向，能动地从边缘向占据话语霸权地位的、强调集权的历史叙述结构挑战；多角力量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在通过自下而上的具有现实替代性历史叙述结构的民族观的建立，力求推动国内外政治力量的平衡与整合，有利于中国的抗战。因此，在广西抗战的现代性、民族性与地域性的交集特征的揭示中，作者从统战学和政治生态学相结合的角度，刻写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坚持原则的理性精神；“既联合又斗争”的政治交往艺术；求同存异原则下的变通策略，等等，作者的“复线的历史”（bifurcated history）叙述，没有仅仅停留在政治活动的抽象意义层面，而将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延展到民族历史时间与共时政治空间的交集之中，并揭示出现实与历史的互动事实与意义，因而，抗战历史研究就可以还原为对“人的存在”的实质意义的究问，并将党与统战对象的历史活动，超越于主体理解的范围，探索政治交往的文化意味和理性精神，从而认识到革命空间的拥有与扩大的逻辑生

① 传统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诗学。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话语概念及含义发生重大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话语理论为当代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后现代的视角。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为研究话语提供了理论基础。而这里谈到的民族文化话语系统就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等诸方面以及民族文化内部相互之间的影响内在机制，并强调了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吸取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内化为民族文化精神，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和科学精神内化为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是建构现代民族文化话语主要内容。

成。这突出了历史研究对新的历史叙事理论的运用，且自觉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与历史原则。

二、历史书写的方法论建构——以史出论，史论结合。

刘绍卫论证广西抗战的重要地位，综合了政治、军事、文化等多重标准，认为它是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的重要战略后方基地、西南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开辟西南国际运输线。在此前提下，他将叙述的重点放在国共双方的统一战线建设之上。他首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倡导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演进：中国共产党对新桂系的政治组织及宣传部门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与桂系在军事思想上取得共识；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对新桂系的统战工作；积极开展对文化界的统战工作；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统战工作。这种对抗战过程中统战工作的强调，着眼于党的工作兼有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使命，因而在传统与现在、帝国主义压迫与要求民族平等、主义之争与民族大义的张力格局中形成的历史共同体，突破了物化的线性历史观，以及单一目的论的启蒙模式，从而使得共产党成为一个能够具有推翻专制王朝、神义道德统治及其现代形态的政治力量，代表了民族历史发展新方向的历史主体。这种带有时代特色的民族主体，指向民族身份认同过程中包容他者/差异新兴的交往理性。

他接着总结了共产党求同存异原则下的变通策略：

第一，广西各级党组织，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派遣党员进入国民党桂系的政治经济文化部门，以合法公开身份掩护党的秘密活动，扩大党的影响和力量（153页）。第二，派遣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桂系办的青年、学生、工人、妇女以及学术团体进行活动，建立各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发动、组织广大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团结进步分子，扩大进步势力，从中培养、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153页）。第三，派遣党员加入桂系地方当局组建的

抗日武装队伍，对其军政人员进行统战活动，取得他们信任和支持，并在工作中起领导和骨干作用，带领这些队伍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53页）。第四，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还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对党在桂林的组织工作经常给予指示（154页）。

这样，就在共产党为拯救民族危亡的努力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内的当局者、政治家与普通民众对本民族当前的任务的共识，共产党这种鲜明的历史意识，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与历史的正义性完全结合起来：

1.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国民党桂系以民族大义为重，构建了中国共产党与桂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73页）。2. 中国共产党支持桂系抗日政治立场，使双方逐渐达成抗战共识，推动国民党桂系在民族大义的认同中从“剿共”到联共抗日的转变。（81页）。3. 重视文化教育，开展国民基础教育普及活动，提高国民的抗战文化素质（83页）。4. 推动新桂系顺应时代潮流，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比较注意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87页）。

三、突出抗战的文化意义——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探讨。

随着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对国际政治影响越来越大，文化建设作为精神文化的核心越来越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文化因素整合到政治研究当中。抗战文化作为应对日本军事侵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而产生的文化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抗战文化的领导权问题历来是抗战文化研究的重点，刘绍卫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着重对桂林抗战文化城的个案分析，指出：

1. 桂林抗战文化是国统区宣传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 (25 页)。

2. 创造了大量抗日文化的精神产品, 丰富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内涵 (27 页)。

3. 桂林文化城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 (28 页)。

这样, 作者力图通过共产党在桂林文化抗战实践的个案分析, 探索其在现代理性的知识和话语的系统建构过程中, 在政治力量多样化中如何完成现代性的启蒙和文化的创新。这样, 就要求共产党在民族—世界图式的建构中, 随着社会的变迁, 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 继承民族传统, 吸收异域优秀文化, 推出自己的民族历史叙事策略, 使抗战文化深蕴着一种生命力, 文化传统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继续和发展。这样, 在世界视野中观照中国—广西抗战, 使真正的民族主义具有了一种跨国界的想像力, 它的目的是要超越于帝国主义的权力统治, 使抗战文化获得一种创生气质和民族凝聚力量。同时, 作者在探讨历史与话语的关系时, 站在历史和现实的高度, 完成政治史与民族史的叙述结构与修辞策略的一致性, 深入到国家文化安全命题, 进而推导出通过寄寓合法性的民族传统来建构身份认同的政治学, 从中汲取力量, 并结合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以抵抗西方帝国主义政治扩张的途径, 并借此形成民族主义与历史主体性发扬的文化多元主义历史研究视阈, 显示出一定理论思考力度。这种把话语分析与政治分析相结合的叙述结构, 在当代表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历史建构作用。

作者还对中国共产党在桂林抗战文化城的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方式进行历史考察: ①建立党的组织; ②建立抗日文化阵地; ③通过各种统一战线组织, 广泛团结文化界人士共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④影响进步的文化团体。

当然, 本书也有不足。如抗战的具体史料及其与文化意义的深

度关联的发掘，有待加强；对于抗战时期日本及世界各地的抗战资料的发掘，也是今后工作的重心。作为历史研究，不仅要总结党的历史事迹与贡献，还应进入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建构的高度，这样，既发掘民族地区对于历史的贡献，也表现出中国现代史壮阔的历史画卷对于广西地区政治、历史、文化的建设作用，从而推论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及其对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资源。当然，在一部书中反映这么多的内容，对于一个青年学者，是一种求全责备的期待。

总之，《共产党与广西抗战——政治交往理性的实践》一书，以政治发展眼光来审视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革命活动及其对中国历史的推动作用，视野宏阔又立意精深；作者善于从关键点切入，熔世界与中国、国家与地域、历史与现实、不同的思想文化阵线与政治实践诸多因素于一炉，洞察细微后提炼出复线历史叙述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历史研究领域，深化了对中国抗战文化与中国现代史的理解。它侧重于用马克思主义的交往实践理论，对中国现代史中政治社会互动中形成新的社会共同体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广西抗战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6)
第一节 广西抗战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的历史地位	(6)
一、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的重要战略后方基地	(6)
二、西南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	(9)
三、开辟西南国际运输线	(9)
四、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南方 联络中心	(10)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游击斗争是 华南敌后游击战场的组成部分	(12)
第二节 广西抗战的特点	(13)
一、抗战主体的全民性	(13)
二、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到城乡	(17)
三、抗战形式的多样性	(19)
第三节 广西抗战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的历史贡献	(20)
一、广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号召下，团结抗战，坚持抗战到底	(20)
二、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光辉旗帜	(25)
三、桂军征战南北，威震敌军，树中国军人的英勇 气概	(28)

四、构建了三位一体的战时体系，支援了全国抗战	(32)
第二章 抗战时期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34)
第一节 抗战初期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发展状况	(34)
第二节 抗战期间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发展状况	(39)
一、广西省工委阶段（1936年11月至1939年7月）	(40)
二、桂林、梧州、南宁三个特支阶段（1939年7月至1940年12月）	(42)
三、重建广西省工委阶段与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1940年12月至1945年8月）	(45)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54)
第一节 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交往背景	(54)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性精神的确立	(56)
二、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交往基础	(68)
三、中国共产党有力地推动广西抗战形势的发展	(88)
第二节 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交往实践	(99)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广西的形成	(100)
二、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113)
三、对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	(125)
四、抗战中后期中共广西的统战工作	(131)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统战工作的理性原则	(139)
一、坚持原则的理性精神	(140)
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治交往艺术	(143)
三、求同存异原则下的变通策略	(147)

四、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统战工作思路·····	(149)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统战工作的历史贡献·····	(155)
一、争取、团结桂系抗日,促进国共合作,为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抗日反蒋”转向“逼蒋抗日”提供了重要事实依据,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56)
二、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不仅对蒋介石国民党内政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对西南及其他地方实力派迈向抗日道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59)
三、积聚保护大批抗日文化力量·····	(161)
四、推动了广西全民抗战·····	(165)
五、扩大了革命队伍,保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安全·····	(167)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西抗日救亡运动·····	(169)
第一节 广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70)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与桂林抗战文化运动·····	(177)
一、中国共产党在桂林“文化城”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177)
二、桂林“文化城”前期抗战文化活动·····	(180)
三、桂林“文化城”后期抗战文化活动·····	(189)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与广西学生军·····	(193)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与广西各地战时工作团·····	(198)
第五节 中国共产党对广西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	(200)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广西抗战文化运动·····	(201)

二、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抗战文化运动中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原因·····	(212)
第六节 广西抗战文化精神的现实启示·····	(228)
一、广西抗战文化精神的内涵·····	(228)
二、抗战文化精神对当今社会的启示·····	(241)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西抗日游击战争·····	(244)
第一节 日军第一次侵桂时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活动·····	(244)
第二节 日军第二次侵桂与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	(247)
第三节 中共领导的广西抗日游击战争的地位和作用·····	(256)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西抗日游击斗争是一面旗帜·····	(256)
二、广西抗日游击斗争坚持团结抗战，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在扭转广西敌后抗战不利局势中起了重大作用·····	(257)
三、广大党员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经受了考验，提高了党性，为开展人民游击战争锻炼了革命干部·····	(260)
主要参考文献·····	(261)
主要著述一览表·····	(266)
后记·····	(271)

绪 论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其遗存的封建性和军国主义思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总体来看，战后几十年，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日本军国主义虽然在体制上被打破，但在思想、文化学术层面上，却一直未成死灰。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右翼”日渐猖獗，并努力把这股意识社会化，根据日本资料显示，“目前右翼的团体达900多个，成员达12万5000人”。“日本右翼学者文人写的为侵略战争翻案的仇华或反华的书籍随处可见，还有不少成为畅销书”^①。这反映出以大和民族为中心的狭隘战争观、“帝国主义”想像力在日本具有相当的社会土壤，暴露出日本侵略的文化逻辑和政治野心。综观日本近代对中国的侵略，它已经不同于15—17世纪的倭寇在东南沿海骚扰，而是以长期占领中国，将中国殖民化（即所谓“皇化”）为目的，“不仅是要抗日的中国人的‘命’，而且更要中国人民的‘心’。前者靠刀枪炮就能办到，后者则需要‘文化’这一把软刀”^②。日本不仅对中国实施军事侵略、经济掠夺，还对中国实施“文化战”（思想宣传战、奴化教育战、学术情报战、新闻舆论战、语言文化战、宗教文化战、文学艺术战等），推行“皇国观念”，以摧垮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为日本开辟“侵华第二战场”。

中国人民要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不仅需要军事、经

① 王向远：《日本右翼言论批判》，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② 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济、文化的全面抗战，而且需要突破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等漠视民族主体性与能动性的独裁论，打倒汪精卫之流的亡国论的虚妄，建立一种具有现代性范式和民族自信的民族主体精神。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交往理性实践^①，逐渐确立一种政治伦理交往原则，如遵循“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坚持国共合作；与桂系等地方势力的政治交往则强调“不挖墙脚”；对民主党派，则帮助其发展，如帮民盟建立广西支部等；对进步文化人则从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对百姓则在农村号召减租减息，减轻负担。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灌注，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一种拯救民族危亡的自信和韧性力量。中国共产党以一种无畏的文化自觉和革命气概担当起整合民族力量的重任，并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找到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地方实力派、民主党派、文人绅士、乡党民团、黎民百姓进行互动对话的平台，使社会国家政权、地方当局、乡村社会在抗日救国的旗帜

^① 从广义上讲，从整个社会发展历史来看，实践活动和交往活动总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理性是人类不断认识自身的能力，是人类树立自身各种生存理想、调节与规范自身的欲望与行为的能力，是调控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科技之间相互关系，规范社会、政治制度、道德准则的智性思维力量。理性是精神的，又是实践的，既表现出科学性，又表现出人文性。在马克思看来，交往（Verkehr）是一个总体性范畴，它指认一个系统，包括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语言交往三个层次。对资本全球化这一历史地平线的批判性反思，使马克思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通过“实践的唯物主义”继而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交往实践观是马克思科学把握资本全球化本性和整个人类社会本性的基本视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定位，认为中国革命在一个特殊的交往结构中受世界与中国两者社会状况的制约，因而既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中国共产党的交往实践是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伴的，其核心理念跟“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联系在一起的。本书提出的政治交往理性实践与理性精神，就是力图通过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政治交往实践的个案考察，梳理历史脉络，探索革命发展的规律和文化意蕴，为当代的社会发展提供一面镜子。可参阅任平：《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历史视域与当代意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何萍、张维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